

陈云“鸟·笼”经济治理思想新论

华清君

内容提要 陈云在多年的国家经济治理实践中,既坚持充分发挥计划作用,也善于调动市场作用。他以鸟和笼子为喻说明市场行为和政府调控行为的关系。把市场关在笼子里,就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方向、保障、核心和准绳,以市场规则为规制和约束,以有计划按比例为总控制和总基调。“鸟·笼”经济治理思想本质上意在说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一思想有助于理解和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辩证统一,认清所有制结构对发挥市场作用并无影响,政府采用供给侧与需求侧双轮联动的政策工具治理经济的科学性。

关键词 陈云 经济治理 思想 资源配置 计划经济 市场调节

华清君,扬州大学教授 225009

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黄克诚在向陈云汇报走私、逃税等经济犯罪猖獗及乱上项目、乱涨价等情况时,用鸟和笼子分别比喻经济搞活和经济秩序。陈云对这个比喻进行了深思,此后他在多个不同场合,特别是1982年12月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期间,系统总结阐释了自己的思想:“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调节市场,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计划的指导。”^[1]

陈云的这一思想为党中央所接受,并渐次上升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论断,体现了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以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今天,当我们进一步考量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

本文为教育部2017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陈云财经治理理论研究”(17YJA710010)阶段性成果。

[1]《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各项国策时,陈云的“鸟·笼”经济治理思想具有新的指导意义。

一、陈云“鸟·笼”经济治理思想的实践理性

陈云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运行体制,其制订了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财政、金融、贸易、分配、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项经济政策,保持了生产平稳协调发展,大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建立了不朽功勋。

1. 作为国民经济计划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设计者和组织者,善于以市场手段激发经济运行的活力与动力

(1)在经济体制上,坚持计划的决定作用并同时发挥好市场作用。

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后不久,陈云便洞悉这一体制虽能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初步工业化,迅速奠定国家建设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但统得太死,势必会使市场失去活力。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在大范围内不合理,小范围内还是合理的;社会主义生产在大范围内合理,但小范围内还有不合理^[1]。他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2],比许多人更早地提出了改进计划经济体制,发挥市场作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模式战略构想。在一切以苏联老大哥马首是瞻的年代,能够大胆地对社会经济结构、市场形态进行全面构画,标志着中共对苏联模式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也是陈云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创造性贡献。

文革结束后,陈云着手对国民经济实行冷静调整,深刻反思计划体制。明确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断言今后“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揭示了“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3]。纵观党史国史,“像这样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是计划和市场这两部分、‘两种经济’的统一,明确肯定市场的重要作用,在以往还没有过”,“是党内最早以文字形式论述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文献,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在中央决策层对经济工作的认识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经济体制改革遵循着怎样的原则和方向来进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4]。自此,中共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作用的认识不断迈向深入。在确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总基调总原则后,陈云明确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广要广到国外,深要深到每个人的劳动。搞对外开放不仅要吸引外国人来投资,中国人也可以到国外投资办厂。从自发运用市场和市场经济手段,到自觉明确地提出市场及市场经济作用和地位的思想,他始终强调在坚持计划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4页,第983-988页。

[2]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个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见《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3]指扩大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农产品。

(2)在供求关系上,坚持市场导向,善于运用市场机制。

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之初,陈云就认识到市场机制对激发供给侧活力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计划只能提供大路货,不能激发小生产者积极性;政府统购包销、企业生产供给与市场有效需求不能相互脱节,商品要迅速适应市场需要,农民有搞副业的自由,不能统计划而把市场卡得太死;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根本原因是缺少市场竞争的推动作用,要实行优胜劣汰、优质优价^[1]。二十世纪60年代,他大胆直言,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2],增加农民自留地,活跃农村市场,要始终瞄住农业和市场这两个关键问题,紧盯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这一市场供求关系。

在推进对外开放过程中,陈云密切关注国内外市场状况,率先研究外汇理论、利用外资、引进设备、引进技术。他准确判断当时的国际市场显示出买方市场特点,要求把握有利条件。他支持经济特区试点建设,一方面可以积累探索市场调节的经验、教训、方法,一方面可以促进国内产品、技术、管理借鉴国际先进水平。回顾1956年推行的选购,他指出只有市场物资丰富,出现了买方市场,才能真正实现选购^[3]。这些足见他对市场供求关系认识之先之深。

(3)在收入分配上,坚持公平与效率,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早在主持东北财经工作期间,陈云就坚持以流通和分配环节为切入点,按照市场法则科学处理战时市场价格急剧波动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指出劳资关系是民主的、平等的、两利的、契约的;在生产水平较低背景下,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为保证城乡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一种暂时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4],指明了实行配给制的必要性和市场对于取消配给制的必然性。二十世纪60年代初他坦陈,搞平均主义大大降低了农民积极性,不主张办公共食堂,是党内比较早地认识平均主义危害的领导人^[5]。改革开放初,他要求打破“大锅饭”,打破平均主义,用市场的方法调动人民积极性。

(4)在流通交换上,坚持利用市场工具治理经济活动。

早在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期间,陈云就指出“交换过程对于生产有决定意义”^[6]这一铁律。教育干部“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做一个革命商人”,利用不同市场的价格、汇率变动规律,大力发展边区对外贸易。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初期,要求日用百货等一般商品要变统购包销为选购自销,变自上而下的派货关系为自下而上的选购关系,变统一价格为放开价格,消除地方间的市场封锁,坚持按质论价,尊重市场选择。中美关系解冻后,陈云大声疾呼“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7]他亲自组织研究世界市场价格、国际金融货币、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当代资本主义特点等问题,探求国际市场价格即期变动、长期趋势、频率周期等规律。他敏锐而又细致深刻地认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对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影响,要求认真研究世界发达经济体货币发行、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黄金产量、美元分布、工业行业及其兴衰情况、危机应对策略等;精辟而又极富远见地指出,美元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仍是国际上无法替代的主要货币。

2. 作为市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探索者和倡导者,坚持以计划手段增强政府在经济治理中的

[1][2][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3页,第1321页,第1612-1613页,第1257页。

[4]《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261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7]《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主导作用

陈云的经济治理实践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基于国情创造性开展的慎重决策和伟大实践,总体上采用了政府主导下的计划和计划经济治理手段,在确立经济运行体制、设计部署具体政策措施以及执行、监管、评估各项政策措施有效性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1)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效监管市场,治理市场失灵。

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物价飞涨,市场无序,陈云围绕“两白一黑”^[1],通过市价扬抑,使投机商受到重创;在统一货币并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流通面的基础上,全国统一全国财经,采取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吸收定期存款等办法,缩小财政赤字,有效控制货币流通量,对稳定金融物价起了决定性作用,免除了人民饱受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之苦。为了避免市场呆滞,他发出“两路救兵”^[2],增加有效需求,提振市场活力,使五种经济^[3]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同时,扎实部署“三反”“五反”,健全预决算、专项审核、财政检查、货币管理等制度,坚决治理经济领域不法行为,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监管中的主导作用。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陈云及时分析市场状况,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处理货币发行失控、投资过度、物价上涨、经济过热、工资改革等问题,显示出在市场失灵背景下高超的经济治理能力,在党内较早地论述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之间的关系。

(2)发挥财政先行资本作用,集中财力推进国家重大建设。

在稳定新中国初期的市场秩序后,陈云果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开展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如娴熟运用货币发行与流通规律,兴建水利、电力、交通、通讯等重大基础设施,优先发展粮棉、纺织、橡胶、化肥、煤炭、农业机械等民生产业;高度重视粮食、副食品的生产、供给,强调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一系列措施既保证了在国家极度困难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又注意集中有限力量开展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所迫切需要的生产能力建设。

(3)发挥计划理性,全面布局现代工业体系,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新中国初期经济凋敝,国力孱弱,陈云审慎实行粮油棉统购统销配给制政策,保证国家建设需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计划经济运行模式;高屋建瓴制订实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全面构建了新中国现代工业体系,合理布局区域经济,增强了工业生产能力;明确了政府间权责关系,构建了新中国财政管理体制,调动了中央地方各方面积极性。

在计划经济治理过程中,陈云始终坚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善于以价格杠杆调节社会的供求关系,有效控制货币流通量,注意保持国家积累、城市就业人口、城乡收入分配、市场购买力、商品供给能力等之间的平衡。坚持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分清轻重缓急,不搞急躁冒进,正确处理建设与民生、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等各方面关系。

改革开放过程中,他反复强调,对带有全局性的、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要坚持政府计划干预,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1982年他指出,产品有没有销路,原料从哪里来,这些问题资本主义企业里相当有计划^[4]。后来邓小平也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5]。

[1]指大米、棉纱、煤炭。

[2]指扩大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农产品。

[3]指国营经济、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3页。

二、陈云“鸟·笼”经济治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鸟·笼”思想清晰地总结了陈云经济治理的智慧,形象地展现了他对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对市场规则的遵从意志、对政府治理市场的掌控能力。

1.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鸟·笼”思想虽然是他在晚年阐释的,但回顾他领导、指导国家财经治理工作的一生,不得不说,他的市场和市场经济治理理论和实践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1)“笼子”即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于1979年初,是陈云开展决策、实施方略的基本遵循。社会主义道路是管控“笼子”的方向标,是根本。改革开放后,陈云告诫全党同志,“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1]

人民民主专政是“笼子”的守护神,也是保护“鸟”自由权利的卫士,是保障。市场活动要始终限定在“笼子”管控的范围内,市场活动的主体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市场规则,必须坚持公平正义。无论“三反”“五反”,还是改革开放,陈云始终注意运用国家法律、行政等手段,维护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的良性运行秩序。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编织“笼子”的准绳和方法,同时也指导着“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是灵魂。文革后,陈云经常勉励中央年轻同志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用;在研究计划和市场问题时指出,坚持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自于马克思^[2]。

中国共产党是编织“笼子”的主人翁,是核心。无论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或是行使人民民主专政,都要紧紧依靠共产党领导。陈云指出,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投机诈骗,贪污受贿,非法致富^[3]。他告诫全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4]。

(2)“笼子”即市场规则。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下的市场,都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则。这些规则有的是以国家法律、政府规章的形式呈现,有的是以行业章程条约的形式呈现,也有些属于非正式约束。

文革期间陈云协助周恩来总理抓外贸工作,一到任就亲自拟订并组织研究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和货币方面的十个问题,每一条都瞄准市场或市场规则。在研究期货市场、资本市场时指出,“交易所是有两重性的,一是投机性的场所,二是大宗交易的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的另一面,因此,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5]所谓“学会游泳”,就是熟练掌握并自觉遵守和运用市场法则。

现代法治国家的市场追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理想状态,保持这种状况的市场应当秉持自愿、平等、互利、守约等交易原则或价值理性。陈云在长期的经济治理实践中所颁布的政策、制度等规制、约束着市场活动,其中所倡导的正是这种理想状态和价值理性。

(3)“笼子”即有计划、按比例。

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总体框架和市场规则的一般要求下,有计划、按比例,是让所有“鸟”的活动及

[1][2][3][4]《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350页,第244-245页,第352页,第273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3页。

其活动结果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健康稳定状态的保证。

在计划经济背景下,计划是国家各主要行业经济活动的总控制,而按比例则是对国家治理层面设定的战略总基调,即保持行业之间、年度之间产品供给的比例总体上协调。不仅对总供给、总需求做出考量,更要对再生产、消费做出安排;不仅要配置好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还要使区域之间、产业链之间做好衔接;不仅要考虑城镇,还要考虑农村;不仅要瞄住国内平衡,还要讲求国际国内之间平衡;不仅要维护财政、物资平衡,还要保持货币、外汇平衡。陈云显然是揭示、运用和发展这些比例控制理论与方法的卓越领导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面临更多挑战和风险,有计划按比例显得更为重要。为了保持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在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市场,国际国内利率汇率政策工具的运用,产业结构、工业体系与技术能力,能源、原材料的供求与储备,政府生产性投资与公共财政投入等方面,要求宏观安排在有计划按比例的总控制和总基调上更为精准。

2. “鸟·笼”思想的本质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陈云的“鸟·笼”经济治理思想,形象地描述了市场的自由性和政府的理性,本质上说明了在市场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间的适应程度一方面体现着市场的发育程度与自治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着政府在国家经济运行中的指导作用与管控能力。

(1) 笼子的大小和形式应当由鸟的天然属性和成长性所决定。

鸟的活性是天然的、感性的,而笼子是人为的、理性的,笼子的大小和紧密程度应该由鸟的天然属性和成长性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监管市场,首先是建立完善市场规则和治理机制,编织监管市场的“笼子”,形成和稳固政府关于市场活动的价值导向。

市场分类与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技术进步等决定着市场运行和治理的复杂度。不难想象,市场分类越复杂,商品总量越大,交易类型越丰富,交易量越大,交易频率越高,市场运行和治理的复杂度越高。市场越开放,对货币价格及其形成机制与形成过程影响越大,国际贸易与结算的风险越高,市场运行和治理的复杂度也越高。技术进步对市场的影响很多是划时代的,当今飞速发展、无所不用的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交易方式、交易速度、交易安全等影响是革命性的,也加大了市场运行和治理的复杂度。陈云强调,“笼子”该多大就多大,意在说明政府监管市场的方式、方法等必然取决于市场的类型、规模、性质、开放度、技术手段等。

(2) 笼子大小适度是鸟儿之间长期协调公平高效活动的保证。

自由市场的治理有赖于参与其中的个体和社会组织。成熟市场的交易规则是人们在若干年交易实践的演进中自然形成的,不存在没有规则的交易市场,也不存在没有规则的市场交易。因此市场自身也有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笼子”,“鸟”从来就不是绝对自由的。

但市场交易的自由、活跃、秩序以及不同市场间的融合,不仅受市场的自然法则所促进和保护,更需要社会的法治和政府的监管做保证。社会的法治是对市场规则运行秩序的维护,也是对政府监管行为的约束。这个过程是政府与市场联动,按照市场发育程度和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财政、货币、物资平衡实现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以及国际国内市场平衡的综合平衡的过程。同时,市场失灵、道德失范等需要政府维护市场的信心和秩序。这一作用的发起时机和时长,一方面取决于发生的期间和领域,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府和市场间的协调性。因此,政府调整“笼子”尺度的过程主要是通过经济杠杆调节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维护经济运行秩序的过程,目的是让“鸟”在市场法则和政府规则框架内自由翱翔。

陈云讲,“笼子”的大小要合适,旨在说明“笼子”的大小既要以保持市场的流动性为评价标准,也要始终以规定市场的公平正义、信心、秩序等为总体价值导向。

(3)国家的统一的大笼子、地区的行业的小笼子是主从关系也是互适关系。

国家对整个市场的监管是一个大“笼子”,但大“笼子”里还有很多小“笼子”,这就是不同地区、行业、产业的市场规则,而不同的“笼子”里也会有不同的“鸟”。

小“笼子”之间应当是相互开放的,“鸟”不仅要在一个小“笼子”里飞,还可以从一个“笼子”飞进另一个“笼子”,在小“笼子”之间以及在小“笼子”与大“笼子”的空间自由流通。这个过程中,本地“鸟”和外来“鸟”应当享有均等待遇,这是“鸟”的自由和权利,也是成熟市场基本的应有的特点。在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上,一方面要根据地区间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历史文化等差异做好行业、产业的分类布局规划,另一方面要消除地区间壁垒,促进市场的交流互动。地理区位、文化禀赋、政策习惯等方面差异,必然造成地区间市场发育的不平衡,因此,在保证国家市场统一性和承认地区间、产业间、行业间市场差异性的基础上,要根据市场需要适时调整大小“笼子”的尺度、结构、布局等。

陈云说,“笼子”要经常调整,就是说“笼子”并非一成不变的,而要因时因地因条件加以调整,保证“鸟”不仅在某个地方,也可以在全国自由翱翔。

(4)鸟在全球大笼子里的自由度,取决于其开放包容和独立自主的能力。

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市场和“笼子”,彼此间开放市场要基于共同遵守的规则。国家之外是世界范围的市场和“笼子”,比如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致力于搭建成员国间共同市场和开展全球市场治理的多边合作组织。但在国际市场中,既要开放包容也要独立自主。

坚持开放包容,让“笼子”更强大、“鸟儿”更健壮,是不发达国家实现富强的必由之路。国家之间都需要对方市场和向对方开放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大“笼子”既容纳了包罗万象的商品与服务,更融合着各个发达经济体积淀下来的治理市场经济的文明智慧。只有积极融入国际市场,才能更加丰富物质资料,更好地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是不发达国家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略。发达经济体市场规模和力量宏大,治理市场的规则体系完善,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强势话语权。不发达经济体的原材料、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是他们向发达经济体引入先进生产技术、劳动工具,换取紧缺生产生活物资的资本,常常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尖端技术或设备的受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新中国初期,陈云主持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工程,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构筑了支撑国家自力更生的工业体系基本格局,为抵御历次国际贸易争端、摩擦奠定了基础。

坚持独立自主和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才能在国际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今年,美国单方面挑起了中美贸易战,最终孰胜孰负还不可妄断。但从道义上看,贸易争端应当以平等为前提,协商解决;从规则上看,国际贸易平衡应当由市场去决定,市场主体根据各自需求和市场规则自主选择交易,不应由政府限制或禁止一些交易,人为造成贸易失衡;从时代潮流看,坚持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格局,实现国际自由贸易,是大势所趋,惟有做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重要贡献者,才能赢得世界;从经济影响看,我国一些产能过剩、有害生态环境的产业正在被限制或淘汰,创新型、环保型产业刚刚兴起,经济下行更多源于独立自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非贸易战,“一带一路”等战略实施必将带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不仅是全面深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改革,也是与世界人民共商共享共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伟大历史变革。

陈云指出,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就是说只要鸟足够健壮,只要掌握和适应各种规则,就可以大胆地参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为我所用。

3. 陈云经济治理思想的重要特点

回顾陈云同志领导或指导国家经济治理的历程,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实践精神,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传统理论和实践经验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

(1)陈云的政治学辞典中从未缺少过商品、商品经济、市场、市场经济。

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商品”、“市场”这些在当时被视为非社会主义的元素,而从来没有离开过陈云的思想和财经治理实践,陈云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商品、商品经济、市场、市场经济思想观念的领导人之一。每当国家经济运行遇到重大困难的危急时刻,他常常临危受命,人们总是希望听到他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1],他常常能针对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弊病,创造性地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治理成就。毛泽东赞曰:“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2]

(2)陈云的经济治理思想无法脱离时代。

陈云经济治理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根植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另一方面是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制度的认识和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样板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瞩目。1987年12月18日,陈云在与胡启立谈话时指出,赵紫阳讲“过去我们学的是苏联那一套”,“那时,我们不能不学苏联,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学美国行吗,学英国、法国行吗?当然不行,只能结合中国实际向苏联学习,没有别的选择”^[3]。因此,他的经济治理思想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国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环境以及中共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因而在主观认识上存在必然性。另一方面,对于计划经济手段,特别是配给制,并非人们传统认识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所独有,二次大战中的英国就曾实行过配给制,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初才最后取消。可见配给制是在国家物质资源匮乏、经济极端困难背景下,为集中有限国力应对战争等必需支出,不得不采取的一定时期内的有效形式,因而在客观经济运行上也存在着必然性。他分管经济工作,也必然地要根据中央决策和他个人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发挥更具体更实际的作用。

(3)陈云经济治理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又超越了时代。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社会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确立与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在一个地区都不可能,毋庸说全国范围。在观念上,改变一小群人都不容易,更不用说改变全国人民。以生产生活的基本事实为基础循序渐进地让执政者和全体人民接受市场的观念,实际上正符合陈云一贯的“交换、比较、反复”的哲学思想和实践方法。

从教育干部掌握供求规律开展商品交换活动,到运用供求规律管控市场物价;从提出并实行配给制同时指出配给制的权宜性,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也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从提出并实行以市场经济手段作为计划经济补充,到提出并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政策等,陈云对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和对经济运行新体制的探索,直接体现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今天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轨迹充分反映了我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

[1]胡锦涛:《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05年6月14日。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5页。

深化和完善。以陈云为主要成员的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这一探索过程是十分艰辛的,他的思考和实践超越了那个时代。同时,没有那个时代的艰险探索和反复验证,就很难使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其理论与实践就很难在短时间内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即便是探索建立运行计划经济体制,陈云的治理理论也是超越那个时代的。他曾回忆,“我们是学了苏联之后,并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那时苏联驻华大使叫库兹涅佐夫,我问他,你们对资本家怎么办?他说,扫地出门。我对他说,我们对资本家是给定息的办法。他回答说,列宁主义里没有讲这个问题。”^[1]“毛泽东称赞陈云学习苏联但不教条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2]充分体现了陈云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开展经济治理实践的思想方法。

三、陈云“鸟·笼”经济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国内政策上,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提倡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要求政府只对经济起调节作用和规定市场活动框架条件的作用;在国际政策上,强调国家间应相互开放市场,支持全球性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这些思想本来有着合理的成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新成果。然而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其触角逐渐由理论界转而开始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从拉美、东欧、俄罗斯等地区或国家的实践可以窥见,新自由主义已经沦为发达国家经济上奴役、政治上扼制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理论武器。相较之下,陈云的“鸟·笼”经济治理思想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保证市场的自由和决定性,把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交待清楚,另一方面不是把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而是多种所有制经济一起在市场中自由运行和发挥作用,与当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着同工之妙。

1.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是所有领域

一般而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两个层面涵义的综合,一方面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的必然规律,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准公共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

公共资源存在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公共需求,解决公共需求只能通过政府提出初始的资源配置计划和建议方案,经代议制机关决策,最终由政府实施。这其中能够让市场发挥作用的环节主要在最终实施阶段。这个阶段,政府开始实质性地调集资源,以生产和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如何取得和组合这些资源,可以用行政方法,也可以调动和发挥市场作用。显然,市场的竞争机制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性,避免政府干预下要素流动由少数人的意志甚至由寻租活动所决定,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成本,也提高了政府的廉洁性、公共性。同样,在前期的计划、方案上,也可以发挥市场作用。从效率角度看,市场决定下的资源配置自然地投入产出比更高的领域和方向汇聚。但社会不仅对收益率高的产品或服务有需求,对收益率较低的产品或服务同样有需求。一些需求带有公共性,比如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需要财政发挥先行资本作用;也有一些需求虽然属于一般竞争性领域,但投入产出比、综合收益率较低,竞争市场很难将稀缺资源投向这些领域,需要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购买产品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2-1783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

或服务等形式,支持其所需要的要素资源。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社会绝大部分产品或服务都由政府提供,国家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陈云在经济治理中所倡导的恰恰是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

2.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这种作用不一定是正效应的,因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市场的自由运行和自主调节在某些领域某些时期会失灵,比如金融恐慌、经济危机等,市场难以自救,需要政府依据市场运行的形态作出相应抉择,运用财政、金融等手段,校正资源配置方向,提振市场信心,平衡供求关系,保持经济增长^[1]。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笼中之鸟”身在笼中,难以看清全局,因而具有局限性,需要借助“笼子”之外的眼睛和力量。当社会的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越过警戒线时,需要用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调控宏观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会受到受益地域和价值取向的限制。这一过程中局部市场可能自发形成这个市场共同认可的交易规则,市场受益区域越小,越容易形成共识,人们的价值取向也越容易趋于一致。区域超越一定的管理幅度,如国内跨地区、跨省份,就需要发挥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因为地区间的生态保护、贸易公平、市场竞争、公德塑造等,需要政府间协同推进;而跨国、跨洲乃至全球一体化,则必须发挥国际间双边或多边的政府间合作组织作用,因为除了贸易规则,还有法律、货币等政策需要政府间协商一致。

3.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妥善处理贫富分化和社会公平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于保证市场参与者自由平等竞争,使社会的要素资源按照帕累托效率所追求的形态配置和分布,不断激发社会创造财富的活力。

这就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通过社会的再分配机制,保持社会成员收入总体上不产生过大分化,促进橄榄型社会收入形态的形成;通过市场管制,维护资源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良性运行;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区域间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均衡化供给;通过先行资本,保证公共基础设施的顺利建设,为后续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产品生产和服务供给创设基本条件等。因此,不断消除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生态平衡运行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把整个社会不断推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理想境界,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4.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因为所有制结构而受到影响

市场要求参与其中的个体能够自主决定参与交易的类型、方式、价格、数量、时机等,个体之间人人平等,共同遵守市场公认的规则。多种所有制结构下的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同样如此,只要不享有超然于市场规则的任何特权,就不应当受到歧视。事实上,公有制经济并非必然造成垄断,也并非必然产生不公平。公有制经济主体能不能存续下去,最终取决于市场的自然的选择,就像市场既选择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也选择了华为、腾讯、阿里巴巴一样。从另一个角度看,公有制经济主体的经营所得属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公共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由人民共同支配;而垄断资本控制下的经济主体的经营所得属于私人所有者,其结果必然是,国内社会贫富不可避免地进一步两极分化和全社会财富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流向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发达国家。

5.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双轮联动

政府通过政策工具干预市场,但这些工具是来自供给侧还是需求侧,要由市场运行的具体性态而定,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政府作用发挥得是否“更好”就体现在这里。

[1]华清君:《论新一轮体制改革的价值向度》,〔北京〕《财政研究》2015年第4期。

当市场总需求低于总供给,社会失业严重,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要及时运用财政、货币、汇率等政策,增加就业,拉动消费。而当市场供给方式落后,甚至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需求动力不足时,政府要及时通过财政、信贷、汇率等政策,开拓新兴市场,鼓励技术创新,在有效化解现有供给的同时,及时调整供给结构,增加新需求。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1]

从当前我国市场运行状况看,政府的任务是建立起以价格信号为引导,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保证市场自主完成供给结构调整,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更好满足人民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理论以我国国情为基础,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治理文明中的合理成分,而不是机械地全盘地照搬。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2]

四、结 语

陈云的“鸟·笼”经济治理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治理经济的高超智慧,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正如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的,陈云同志坚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3]他一贯善于利用市场和市场经济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对市场和市场经济开展治理的过程中,既维护市场运行的自由,又使市场运行遵循“四项基本原则”所确立的价值理想、合乎市场规则、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当前,我国正着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与治理的体制机制,陈云的“鸟·笼”经济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有助于认清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无影响;有助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防止陷入新自由主义和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

[责任编辑:如 新]

[1]习近平:《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推动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发展》,〔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1月23日。

[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3]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